



北宋

初期进士研究

徐红 ◇ 著



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宋

初期进士研究

徐红◇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鹏鸣

封面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周 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宋初期进士研究/徐红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

ISBN 978-7-01-007561-7

I. 北… II. 徐… III. 进士-研究-中国-北宋 IV. D6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5849 号

北宋初期进士研究

BEISONG CHUQI JINSHI YANJIU

徐 红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299 千字

ISBN 978-7-01-007561-7 定价:2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宋代政治的一个最大优点,就是它的理性化和人性化的程度较高,其制度、政策中所体现出的合理性和公正性比较明显。这不是说它没有野蛮、暴戾、残酷、“相斫”的一面,更不是说它已经脱退了王朝政治的“专制底色”;而是说,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其他王朝——无论是它之前的汉唐,还是它之后的元明清——相比,宋代政治可能要更阳光、更温润一些。

这在宋代政治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都有明显表现。

如“宋氏启运”。宋朝起始于“陈桥兵变”,陈桥兵变的最大特点,就是黄仁宇先生所说的,开创了“不经过流血而诞生一个主要的朝代之奇迹”^①。它基本上是一次和平兵变:没有喋血宫门,更没有烽烟四起,几乎是“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就取得了改朝换代的成功。这其中当然有兵权与实力威慑的因素,但是,兵权、实力、绝对优势等等,只能保证兵变的最终成功,至于以什么方式成功,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的谋划水平和政治良知。从“陈桥兵变”的整个过程看,宋太祖赵匡胤不仅一开始就反复“严敕军士,勿令剽劫”,而且还通过若干具体细密的措施控制局势,最终保证

^①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2页。

了兵变入城时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并由此赢得了民心：“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宁谧。”①《邵氏闻见录》卷七载：

先是京城居人闻上至，皆大恐，将谓循五代之弊，纵士卒剽掠。既见上号令，兵士至，即时解甲归营，市井不动，略无骚扰，众皆大喜。……满城父老皆相贺曰：“五代天子皆以兵威强制天下，未有德洽黎庶者。今上践祚未终日，而有爱民之心，吾辈老矣，何幸见真天子之御世乎？”

陈桥兵变虽然也是“以兵威强制天下”，但与五代其他兵变相比，的确又有很大不同。它背后凝结着更多的理性和人道，蕴涵着一种对社会、对百姓负责的政治良知。时人正是从这种理性、人道、良知中感受到了希望：“以兵威强制天下”的历史正在结束，天下将由分裂战乱而走向太平。

当时远在四川的后蜀政治家也朦朦胧胧地察觉出某种相关的信息。后蜀宰相李昊奏报蜀帝曰：

臣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天厌乱久矣，一统海内，其在此乎。②

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此的认识也越来越明晰了。如苏轼、范仲淹、朱熹等众多文化名家，都对“宋氏启运”过程中的理性、人道、良知予以极大推崇，认为“祖宗以仁义开国”，“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仁之至也”，“国初便知崇礼义……已自胜如唐人”，并明确地把“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归结于陈桥兵变时的“不嗜杀人”，“得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故天下一于宋”③。明清之际的大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正月癸卯，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乾德元年五月。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正月乙巳条引苏轼等人语。

学者王夫之,由于摆脱了“本朝情结”,因而又有了更为客观,也更为深刻的认识:

赵氏起家什伍,两世为裨将,与乱世相浮沉,姓字且不闻于人间,……乃乘如狂之乱卒控扶以起,弋获大宝,……受非常之命,而终以一统天下,底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称盛治者,何也?唯其惧也。惧者,惻怛不容自宁之心,勃然而猝兴,怵然而不昧,……人之能不忘此心者,其唯上哲乎!……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而自唐光启以来,百年器陵噬搏之气,寝衰寝微,以消释于无形。盛矣哉!①

王夫之的既不避讳赵氏起家低微和得国之际的“非常”之手段,又能以达观豁朗的态度,烛照出赵宋建国过程中的理性、良知及其意义:惧、慎、慈、和、文,无一不是理性与良知的体现。起家低微的赵氏,正是以这种理性和良知,在“百年器陵噬搏之气”中营造一个宽仁宁谧的立国氛围,从而开启了唐宋之际天下由乱而治、由分而合的根本转机。

这种文明理性的政治氛围,不但体现于“陈桥兵变”中,也表现在如何处理开国功臣这个传统政治中最棘手的问题上。

“鸟尽弓藏,兔殒狗烹”,即诛杀功臣,是一些开国之君惯用的手法。这虽然可以解决功臣对兵权的威胁,但伴随而来的腥风血雨,却会造成沉重的阴影,扭曲和损害几代人的心智,从而对政治的昌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而宋初却选择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这样一种较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杯酒论心,大将解印”,谈笑之间,解决了一个历代深感棘手的问题。当然,实际过程不会如文献记载得那样简单和戏剧化,但自建

① 王夫之:《宋论》卷一《太祖》,中华书局1964年版。

隆二年(961)七月后,绝大部分功高资深的禁军将帅既被解除了兵权,又保持了同皇帝的亲密关系,却是事实。这表明,宋初皇帝与功臣夙将的矛盾已经化解在一种较为宽缓、平和的气氛之中了。

“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规模可以豫知矣。”其所造成的“文化效应”,其形成的“祖宗家法”,的确可以影响和决定一个王朝的基本性格。如果将宋朝开国之际的“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和“杯酒释兵权”等等与两宋政治的某些特色联系起来考察,自会发现更深一层的意义。

关于两宋政治的特色,宋人其实已多有总结。如邵雍、二程、范仲淹等,曾将“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与“祖宗以来,未尝轻杀大臣”,“未尝杀一无罪”等等称作“本朝超越古今”的“盛德之事”^①。蔡确、吕大防等,则把“百年不诛大臣”,“不杀谏官”,“不以文字罪人”等统统与“祖宗家法”联系起来,认为“三代之后,惟本朝所立家法最善”^②。苏轼在论及本朝的言论自由时说:“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并认为正是“祖宗深虑”所致^③。南宋名臣留正则更以“自古所无者三”(邵雍、二程等文化大家则有“自古所无者五”之类的说法)来标榜宋代政治:

本朝自古所无者三:艺祖皇帝受命之日,市不改肆,一也;祖宗以来,传世仁厚,虽甚威怒,未尝妄杀,故论者谓不嗜杀人,惟本朝有之,二也;徽、光两行内禅,皆出自睿断,三也。^④

①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八;《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等,《学津讨原》本。

② 参见徐规:《宋太祖誓约辨析》,《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③ 苏轼:《苏轼文集》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④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中华书局1956年版。

“自古所无”云云,自然不免夸张,但也的确道出了宋代政治动作中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受命之日,市不易肆”,较之于喋血城门,以暴登基,无疑多了一些理性和人道;威怒有度,不诛大臣,不嗜杀人,较之于“天子之怒,伏尸百里”,无疑又少了一些蒙昧和野蛮;至于“内禅皆出自睿断”(即皇帝本人自愿让位),较之于惯常的皇位争夺,也多少显示出理性与蒙昧的分野……总之,在宋代政治生活中,野蛮、蒙昧的因素在削减,人道、文明的色彩在增多,政治动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

上述这些观点,我在《金匱之盟真偽考》(1993年)、《论“杯酒释兵权”》(1996年)、《论“陈桥兵变”》(1997年)、《官家与宋代皇权的理性定位》(2006年)等论文中已有一些涉及。现在集中起来讨论,大抵可以看出宋代上层政治,尤其是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某些值得肯定的政治特色。

从赵宋统治阶层处理外部诸多关系方面,也可以看出上述特色的某种逻辑延伸。

如,在处理宋辽之间有关“燕云十六州”的历史遗留问题时,宋太祖首选的不是战争,而是“和平赎买”的方案。

又如,在处理民众与政府的武装对峙时,政府方面的基调也是对话与和解,双方的博弈,一般是以政府方面的“招降纳叛”得以了结,以至于“要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成为宋代民间的流行话语。应当说,这是“庙堂”与“山寨”之间的一种互为妥协和互为克制,也是“刚性对峙”的理性化解。说到这,自然又联想到《水浒传》中或宋代历史上的水泊梁山:这一个名气最大的“山寨”,其首领个人的结局可能是悲剧的,但“山寨”的“和平瓦解”却同样折射出宋代政治中的某种值得肯定的特色。

在制度和政策的层面上,宋代政治的理性化主要表现为程序

的正义与公正。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它的科举取士制度。

与唐代相比,宋代科举制度发生了很多变化。一是科举制度的内容规范化,基本上以诗赋和经义为主。二是“殿试”成为制度,使考生直接成为“天子门生”,以提高读书中举的荣耀感。三是考试规程更为完善,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出题、评卷、定等办法和考场规则,形成了相对公平的竞争机制。四是应试对象逐渐放宽,取消了隋唐时期考生的身份限制,工商异类和僧道归俗之人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五是录取名额大幅度增加,唐代每科取士不过20人,而宋代太祖每科已达90人,太宗时每科500人以上,真宗时开科9次,取士5000人,仁宗时开科13次,取士超过万人。六是进士授官十分优渥,科举得中即释褐授官。“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乃至形成“宰相必用读书人”的传统。这种完善的科举取士政策,几乎包含了政治学中有关“程序正义”的所有因素,因而也就产生了明显的成效。我在很多场合都讲过这样一个现象:在宋代,举凡第一流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无一不是科举出身,而且往往是一举高中;而明清时期则几乎相反,举凡第一流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政治家除外)几乎全都不是科举进士出身,个别得中者,也往往是在屡挫之后(如王阳明,三次方才得中)。两相对比,宋代科举制的完善、公正与合理性就十分明显了。就传统社会所能达到的限度而言,宋代科举的公正性、合理性可以说是达到极致,是中国科举史上的黄金时代。

曾经读过阎光才先生的一篇谈当今高考制度的文章,题目是《迫不得已的荒谬》,大意谓:“在一个以公平为基调的现实语境中,于高考制度之外,人们实在也难以寻找到一个能够与之比肩的相对刚性、规范化且值得信任的制度。然而,撇开公平和程序正义的理念,就是理想化的教育追求和实质性正义而言,高考制度虽不

至于是‘大恶’，但它于现实之中对人性之戕害却是显而易见的。由是，一方面，一些人们恨不得弃之如敝屣；另一方面，又无人能够设计出一个更不坏的制度来取代它，反而是在一个阶层分化已成格局的社会中，人们更加依赖于它。这大概正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高考制度：一种迫不得已的荒谬。”^①

其实，就像现代考试是中国社会最敏感的一根神经，因而它的“坏”和“荒谬”总是引起最激烈的“口诛笔伐”一样，古代的科举取士所遭遇的指斥也是十分猛烈的。奇怪的是，在宋代，类似批评却不多。如果说“范进中举”和“两槐夹井以来”是传统科举取士之“常态”的话，那么，宋代的科举取士就是一个“异数”，无论是就其制度本身而言，还是就其实际效果而言，它可能是历史上“最不坏的制度”了，它包含的“荒谬”也可能是最少的。这是一段值得我们特别留意和思考的历史。

正是因为上述的一些想法长期萦绕于心，因而得知徐红博士的《北宋初期进士研究》这部书稿即将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就感到特别高兴。

徐红博士是在武汉大学历史系完成了本科教育的，2004年，她又考入山东大学，在我的指导下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这部书稿就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需要说明的是，选定以太平兴国五年榜进士为中心的宋初进士进行研究，是徐红依据自己的学术思考提出的。这无疑是有道理的。第一，太平兴国五年，居宋初三朝正中，正如我在前文已提到的，宋初三朝是宋代“祖宗家法”形成的时期，它所孕育的一些优良政治传统，对两宋社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第二，宋初三朝科举考试开考凡35次，其中录取进

^① 《读书》2008年第7期。

士约 3000 余人,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要一一进行考察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有限的史料所不允许的。因此,从中选取典型为切入点就成为研究的关键。本书所选太平兴国五年榜进士,以其地域分布、家世出身、婚姻观念、政治道德及政治行为、文化成就等方面的特征,表现出宋初进士的某些共性,又因寇准、王旦、李沆、向敏中、苏易简、张咏、宋湜、晁迥、谢泌、马亮等众多名臣同出一榜而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因此,以太平兴国五年榜进士立论,既有典型人物的深度剖析和由点及面的渐次展开,又为全面把握宋初进士的特质及宋朝士大夫阶层的发展轨迹提供了依据。

徐红博士有着武汉大学和山东大学的教育背景,这两所大学都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术重镇,既有着“南唐(唐长孺先生)北王(王仲荦先生)”的美誉,更有着十分扎实、严谨的学风。徐红的这部书稿中也很充分地体现出这种学风。除了史料征引的丰赡之外,还有两点需要特别提及。一是对相异的史料记载均以存疑方式详为引出;二是对与其观点相左的史料不予任何回避。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得这部书稿有了一个令人放心的基础。

这部书稿是以“同榜进士”为中心的群体研究。依据研究的特点和需要,徐红在这部书稿中设制了一系列图表,对大量繁杂、琐碎乃至重复的史料予以格式化的归纳、统计和集成,使论点的引出一目了然,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全书的学术张力。这也是这部书稿中值得特别肯定的一点。

徐红当年是以副教授的身份在山大读博的,读博前已发表了一些较有影响的论文;由于对她的学业比较放心,我们之间的学术交流并不是很多,对她的博士论文也谈不上有多少指导。所以,现在阅读这部书稿,一方面有许多新鲜感受;另一方面,我也很想借作序的机会,围绕着与书稿有关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背景式的大

问题,与作者进行一些交流和讨论,以期对包括科举取士在内的宋代政治有一种更为通透的理解。但拉杂写来,已觉枝蔓,也颇难收束。好在前贤已多有高论,不妨转述数则,以明要义。

其一为陈寅恪先生之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①

其二亦为陈寅恪先生之语:宋代为历史上“思想最为自由”的时期。^②

其三为邓广铭先生论宋代科举之语:“种种因素的具备,遂使国内的每一个丰衣足食的小康之家,都要令其子弟去读书应考,争取科名。科名虽只有小部分人能够争取得到,但在这种动力之下,全社会却有日益增多的人群的文化素质得到大大的提高。因此,我们可以说,科举制度在两宋期内所发挥出来的进步作用,所收取到的社会效益,都是远非唐代之所可比拟的。”^③

以上数则,言简意赅,俱为通贯古今的会心之论。以此“关照”徐红博士有关宋初进士群体的研究,其学术之鹄的,当有更为高远的期许。

是为序。

王育济

2009年1月6日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② 陈寅恪:《寒柳堂集》之《论再生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5页。

③ 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

目 录

序	王育济 (1)
第一章 导言	(1)
一、研究对象及研究范围	(1)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8)
三、主要研究内容	(17)
四、所依据的文献资料	(25)
第二章 北宋初期的政治与社会	
——进士崛起的社会背景分析	(28)
一、重新树立君权神授观念	(28)
二、巩固大一统、加强君主权威	(32)
三、武力抵御异族侵扰的失败	(36)
四、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需要	(40)
第三章 政治中心的变迁与进士的地理分布	(45)
一、唐朝进士、状元地理分布简析	(49)
二、宋初状元、太平兴国三年进士地理分布简析	(53)
三、太平兴国五年进士概况介绍	(58)

四、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精英分子地理分布情况分析	(64)
第四章 社会的变革与进士的家世仕途	(76)
一、宋初进士科录取对象的家世变化	(77)
二、宋初宰辅成员的家世分析	(85)
三、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精英分子的家世与仕途分析	(95)
四、家世与仕途个案分析	(104)
第五章 社会意识的变迁与进士的婚姻关系	(124)
一、婚姻个案考察	(125)
二、婚姻特征分析	(157)
三、婚姻与进士的社会交游范围	(172)
第六章 政治环境与进士的政治道德	(186)
一、北宋初期重建伦理道德秩序的社会基础与 历史渊源	(187)
二、宋初进士的修身行德	(199)
三、宋初进士的尊君忠君	(210)
四、宋初进士的弘道于世	(224)
第七章 制度环境与进士的政治观念、政治行为	(237)
一、理性务实的政治观念	(238)
二、典章制度的建设——政治行为表现之一	(254)
三、治理地方的为官实践——政治行为表现之二	(274)
第八章 文化环境与进士的文化行为	(292)
一、宋初君主对“文”的重视	(292)
二、图书管理及修史活动	(302)

三、著书立说及文学成就	(320)
第九章 结语	(339)
主要参考文献	(351)
后记	(365)

图表目录

表 3-1	宋初三朝宰辅成员地域分布简表	46
表 3-2	唐朝前后期进士三大地域分布对比表	51
表 3-3	唐朝前后期状元三大地域分布对比表	51
表 3-4	北宋前四朝状元地域分布表	54
表 3-5	太平兴国三年进土地域分布表	54
表 3-6	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精英分子简表	60
表 3-7	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精英分子籍贯分布表	65
图 3-1	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精英分子籍贯分布图	73
表 4-1	唐朝状元出身情况简表	80
表 4-2	宋初状元出身情况简表	82
表 4-3	宋初三朝宰辅成员出身情况简表(一)	85
表 4-4	宋初三朝宰辅成员出身情况简表(二)	86
表 4-5	宋初三朝宰辅成员出身情况简表(三)	86
表 4-6	太平兴国三年进士出身情况简表	95
表 4-7	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精英分子出身情况简表	96
表 5-1	苏易简家庭姻亲表	125
表 5-2	李沆家庭姻亲表	127
表 5-3	向敏中家庭姻亲表	130

表 5-4	寇准家庭姻亲表	136
表 5-5	宋偓家庭姻亲表	138
表 5-6	王旦家庭姻亲表	141
表 5-7	马亮家庭姻亲表	148
表 5-8	张咏家庭姻亲表	155
表 5-9	马诰家庭姻亲表	156
表 5-10	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精英分子及其子女婚配 对象出身简表	158
表 5-11	北宋三槐王氏家族通婚地域表	179
表 5-12	北宋河南吕氏家族通婚地域表	181
表 7-1	宋太宗朝文官除授机构改革简表	262